

民國新聞

月刊
1920—1928

从『携印出走』到『东北易帜』

政府一日在北京禁城内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并接受南临时政府提出的清退条件最后修凯与南方革命党人预案，以



南京政府“六路北伐”

以湖北籍政治人物为核心的政治团体民社本月在上海成立，黎元洪任理事长，成员有孙武、张振武、刘成昌、蓝天蔚、宁调元、饶汉祥等。民社以卢梭的《民约论》的民主思想为标榜。

袁世凯借口“军费无着”，拿家错“清”裕隆太后空，给太后一个共社稷，然后再给太后一个共社稷：钱差不多花光了，可共



北洋诸将

政府组建

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裕隆太后颁布宣统皇帝“退位懿旨”称，鉴于“全国人心所向，天命可知。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



中华民国元年兆始之日的1912年1月1日，中华书局亦宣布开业。1月2日，大清银行经南京临时政府批准，更名“中国银行”。30日，中国实业协会在南京成立。

满清少壮贵族良弼、溥伟、铁良等本月在北京组成宗社党，宗旨是抵抗共和革命，反对袁世凯篡清廷权位，挽救清朝统治的危局。宗社党成员胸前刺有“双龙图形”，主要在京津地区秘密活动。

袁世凯既要使“清帝退位、达成共和”以获中国之最高统治大位，又不想背“忘恩负义，欺负孤儿寡母”之后世骂名。孙中山南京就职使袁氏内心大为不快，在答复孙文函电时表示“国体解决之前不愿欲闻临时政府事务”，并通过唐绍仪诘问伍廷芳“孙文让位说把握何在？”

内务部颁令保护财产

南京临时政府于1月11日宣布“兵分六路、北上伐清”，组建北伐军海陆军，孙中山亲任总指挥，黄兴任陆军参谋长。总统府设立“北伐大本营”，下辖总



从『携印出走』到『东北易帜』
民国新闻月刊
1920—1928

闻立欣◎编著

古吴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新闻月刊. 1920~1928: 从“携印出走”到
“东北易帜” / 闻立欣编著.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80733-983-0

I. ①民… II. ①闻… III. ①中国历史—1920 ~
1928 —民国—通俗读物 IV. ① K2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33518 号

责任编辑: 王 琦

见习编辑: 赵 妮

策 划: 毕 晶

装帧设计: 王俊波

书 名: 民国新闻月刊

1920—1928: 从“携印出走”到“东北易帜”

编 著: 闻立欣

出版发行: 古吴轩出版社

地址: 苏州市十梓街458号

邮编: 215006

Http://www.guwuxuancbs.com E-mail: gwxcbs@126.com

电话: 0512-65233679

传真: 0512-6522075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33-983-0

定 价: 38.90元

前言

历史是流动的、延续的，永远处于变化状态中的，社会变革仅有缓速显晦之别，没有停滞不前之状，而是以“一个变局趋向高潮而形成新的变局”为周期的。历史又是诸多侧面构建的综合体，是无数突发事件导致定向结局的集合体，其间充满着偶然和必然的交织。

二十世纪初，社会内部矛盾淤积和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持续两千余年的皇权架构跌入前所未有的动荡摇摆状态之中。无论是盘踞京畿腹地的执政者还是流落边关浪迹海外的革命者，都意识到既有统治基础的坍塌已在现实中成为可能。因此，统治中枢试图通过立宪运动等温和制度改良措施挽救朝廷危机，革命党人则寻找一切契机制造激烈制度革命以实现“变专制而共和”。时间至关重要。武昌起义虽是一个偶发事件，但就整个情势而言，革命党人显然在这轮与时间赛跑的竞技场上占了上风，“变局”赶走了皇帝，辛亥革命铸就了民国。然而这个“变局”只是开始而远非高潮。

孙中山所号召的“民族革命”旨在推翻清朝统治权，并非要赶尽杀绝前朝的统治者，“五族共和”原则体现了民族主义的理智性和以文化为基点的包容性。虽然革命难免要流血，但相对于一场社会制度更迭的“变局”而言，辛亥革命并没有如法国大革命的那般血腥惨烈，也没有将前朝皇帝像路易十六那样送上断头台。

然而，由于革命党团体早期活动的秘密性和联络会党倾向，既缺乏现代意识又没有形成严密统一的组织，因此更谈不上自身的军事力量，点燃“辛亥变天”导火索的革命党人是利用朝廷新军而获得首义成功的。这种依靠“体制内”军事力量推翻体制的制度革命所衍生的后果，就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昙花一现，政坛实力人物袁世凯继而登场，从此开始北京政府持续十七年的治理，即所谓“北洋时期”。这种军人专政的事实，是民国初年从专制到共和社会过渡期不可避免的历史后果。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呈现在世人面前的袁世凯是截然不同的形象：“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如同一个硬币两个面。历史人物无法摆脱历史惯性，“忽然间”坐拥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对皇权“统治威严”难以释怀的崇拜心理，导致其帝制用心昭然天下而告别历史舞台，身后遗产除群雄并起的军阀割据、武人当道的北京政府，还有一个捍卫共和理念的西南护国政权。民国开始步入“非典型南北朝”状态。

在民族主义和工业主义双重动力驱使下，各国发展趋向势必打上国际因素印记。中国近代外交开始形成于晚清，民国初年则是中国外交向现代模式的演变时期，国内诸多标志性的历史事件，都与当时的世界大事存在联系。所以民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包含有相当成分的各种国际因素。

孙中山的国际视野显然要比其他民国政治人物开阔。在民国建立后，无论是短暂的临时大总统时日、为发展国家建设奔波海内外期间，还是在护国和护法岁月，他始终在为自己的事业努力寻求各国支持，拓展国际关系空间。一九二〇年四月，伍廷芳上演的“携印出走”一幕酿

成的外交事件导致广东军政府的破局，也为孙氏“回粤重新开府”创造了前提条件。孙中山次年在南方建立政权并称大总统，拉开与北京政府的政权对峙。几经磨难，孙中山最终在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支持援助下，通过国共合作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建立黄埔军校，拥有了一支梦寐以求的“自己的武装”。孙中山逝世后，南方政权最终完成了国家的统一。

透过历史流动性角度观察，从辛亥革命共和肇始，至北伐告捷东北易帜为止，应该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个“历史高潮期”。

在人们一般印象中，这段历史是一段纷繁复杂、波云诡谲、乱象丛生的岁月。从北国到南域，自畿辅至边陲，地方政权割据，国家四分五裂；政客纵横捭阖，军阀骄横恣肆，名目繁多的东征西讨致使黎民百姓陷于连年兵祸；上台下野如走马灯，仅北京政府就更换十三任总统（包括摄行大总统职、临时执政、军政府大元帅等），内阁有四十六届之多，“你未唱罢他登场，城头频换大帅旗”。

但是，这个时期又是从皇权统治到共和政体的转型过渡期，是革旧鼎新、百废待兴的时代，是国家开始融入国际社会的起步阶段。建立国会、制定宪法、普及新式教育、颁布施行各种国家社会治理的制度法规、开展新式外交事务等，为中国从封建王朝走向现代型共和体制奠定了基础。这个时期还是新文化在古老大地破土发芽的年代，是思想启蒙主义实践的年代，是波澜壮阔风云激荡的革命年代。最后，这个时期更是英雄辈出的年代，他们对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国家历程的不同追求和各种努力，为中国之所以成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奠定了基础。

《民国新闻月刊》以“模拟报刊”形式，通过对一九一一年十月至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间中国的历史事件和与中国相关的国际事件的筛选、记述，向读者展示民国初创阶段这个“历史高潮期”的多个场景。本书以月份作为编写单位，按时间顺序为经，以中外事件个案为纬，构成单位时间内的事件综合，采用不分段落形式撰写并配以相关图片。每月以一个或多个对开为阅读单元，所记之事时间以当月为下限，不设严格的浏览顺序，重大事件的过程依事态进程按月份延伸叙述。每月刊头页设要闻栏目。历史乃人与事的结合体，任何人物都是生活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人物，对于当时之事，亦有其当时之认知与评判标准。本着“对历史人物要放在历史中观察”的历史道德原则，叙述内容多采用当时历史环境下人们对所发生之事的态度评价，包括细节描述、报刊评论、文稿演讲、函件通电、外界反应等。书后附有所征引图文资料来源的“参考文献目录”。

《民国新闻月刊》的编撰承蒙诸多人士建议和帮助：北京文通天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人石生琼、禹成豪提供了全力支持，刘君承担了全部图文版面的技术操作，编辑部和出版部的吕夏乔、毕晶、梁茵、李溪、李宁、马野、王艳等为本书最终成型付出了勤恳敬业的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闻立欣

二〇一二年四月

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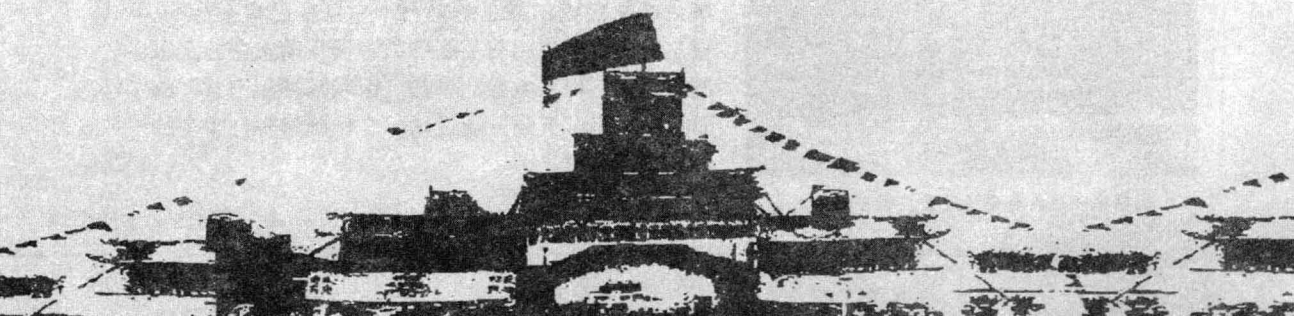
目 录

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	001
民国十年（一九二一年）	035
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年）	063
民国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097
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	127
民国十四年（一九二五年）	163
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年）	193
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	225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261



民国九年

(一九二〇年)



孙中山谈新文化运动 称“革命之成功有赖思想之变化”



“五四”时期的孙中山与宋庆龄

孙中山从五四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趋势中看到思想观念可转为革命的“武器”，学生民众可成一种“政治力量”。在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孙中山谈及此问题时写道：“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抒发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扬葩吐艳，各极其致，社会遂蒙绝大之影响。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国联”诞生“五强”共管世界格局形成 非成员国美利坚召集首次理事会

根据巴黎和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和约》第一章《国际联盟盟约》的规定，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一月十日宣布成立，即“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简称“国联”。“国联”的成员国包括“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各项协约国条约的签字国”和“战争期间的中立国”等，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下设大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五大国代表组成委员会作为“领导机构”，其职能是“相互交换意见并向大会提出建议”，所以，并非所有成员国都是平等的。另外，苏维埃俄国因



国联第一届大会会场外景，瑞士日内瓦



美国总统威尔逊（挥帽者）在法国巴黎

“持续的内乱”而未被邀请参加。成立“国联”的目的，是为避免巴黎和会在领土安排问题的决定引发欧洲不稳定以及防止“侵略国”的再次崛起，这个设想最初源自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纲领”，但因《凡尔赛和约》在国会未获批准，所以美国没有加入。尽管如此，“国联”第一届理事会却是应威尔逊总统之召十六日在巴黎举行的。威尔逊还曾考虑由美英法缔结一项互助安全协定以制衡德国，但又觉得此举与“国联精神相违背”故而放弃，但“五强”通过国际合作确保各自安全的格局已经形成。

京千余书生示威赶总长下台 湘学子造“驱张”声势 鲁教育界吁撤换主管

北京各校全体教职员千余人一月五日包围教育部，要求撤换教育总长傅岳棻，示威者并向傅岳棻“敬献”上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的八字大旗一面。在湖南，湘省学生致电北京政府及广州军政府，为“驱张”运动的开展造舆论和政治声势。吴佩孚对请愿学生表示同情，并电请张敬尧“维持学校，勿再干涉学生的爱国行动”；广州军政府致电北京，要求大总统徐世昌迅速下令，撤换湖南督军张敬尧。山东也爆发大规模“教潮”，济南学生提出撤换警察厅长金桂荣和教育厅长袁立意的要求，声言若不达目的则“全体散学”。济南全体教职员三日宣布“同盟罢工”以声援学生诉求，到任履新的山东督军田中玉不想上任伊始便麻烦缠身，于是用“撤换警察厅长”的承诺换取学生返回课堂，总算是避免了事态的扩大。

蔡元培对记者谈“大学开女禁”问题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一九二〇年元旦，上海《中华新报》刊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答该报记者问，其中在谈及女子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问题时，蔡元培说：“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选举权者。且稽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蔡氏的报界谈话与上年一位女学生的上书有关。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九日，甘肃籍女学生邓春兰公开上书蔡元培，申述民国时代的妇女与男子应该“职业、政权一切平等”，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邓春兰向蔡元培提出“国立大学增设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等呼吁。

民國新聞

月刊

●「工读互助团」在北京成立

●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平民夜校开学

●周恩来主编《觉悟》在天津出版

【东京施压徐世昌取缔反日活动 天津学生因查日货事遭镇压】 日本驻北京公使一月十六日向外交部提出所谓“严重警告”，目的在施压于大总统徐世昌，要求北京政府取缔反日、抵制日货的活动。日本公使十九日再向外交部提山东问题直接交涉照会。广州军政府于二十三日表态“反对山东问题的直接交涉”，非常国会林森等五百四十名议员二十四日联名宣告“停止议宪”。二十九日，天津爆发抵制日货的民众运动，五千学生为检查日货一事遭日本浪人殴打，随后的请愿活动又被当地军警镇压，五十余人在冲突中被打伤，天津南开大学学生代表周恩来、郭隆真、方舟和张若名到直隶公署请愿时被捕，天津学生继而宣布罢课以示抗议。

军警越俎代庖内阁颜面扫地 总理拒绝上班外长宣布辞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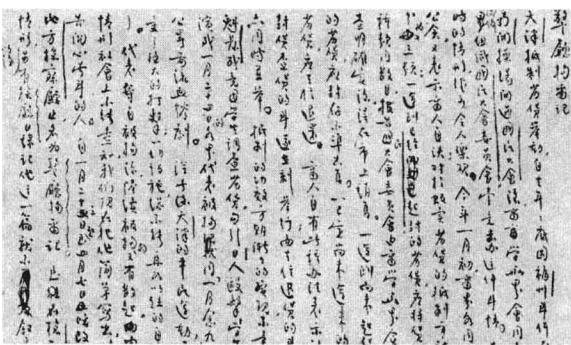
外交次长陈策

靳云鹏内阁中的“文治派”原本打算通过“阴柔”手法“和平消弭”京城学潮，但徐树铮和段芝贵等的“不理睬”行为，使政府和学生及校方的矛盾转为激化，因此感到既然无法约束军人，内阁也就难以为继了。国务总理靳云鹏二月十三日声称“不再视事”，自即日起拒绝到院办公；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陈策亦于同一天提交辞呈，态度坚决，外交部因两位首长均不再履行职责而关门放假。几日后，陈策在多方人士屡劝之下才勉强回到外交部上班。军警当局的越权行动导致“内阁放假”，京城政坛再次酝酿危机。

日起拒绝到院办公；外交总长陆徵祥和次长陈策亦于同一天提交辞呈，态度坚决，外交部因两位首长均不再履行职责而关门放假。几日后，陈策在多方人士屡劝之下才勉强回到外交部上班。军警当局的越权行动导致“内阁放假”，京城政坛再次酝酿危机。

周恩来警察厅撰质问书 杨以德除夕款待被拘学生代表

周恩来等被捕学生代表二月六日被移送天津警察厅，杨以德见到周恩来，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答：“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杨表示，他知爱国，“但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被人利用，这件事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他绝没有一点主张，又加上些“不报私仇、日久见人心”之类的话。周恩来回答：“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对好的例。”杨以德听罢没再说话，临走时要警察把新做被褥取来，对周



周恩来在拘押期间所写《警厅拘留记》手迹

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拿给我看。”因此周恩来到警察厅伊始便得了写稿子的自由，当天下午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在被拘期间，周恩来还写下《警厅拘留记》，其中载有农历除夕杨以德请被拘留学生代表会餐一段：“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杨以德命门口餐馆预备五桌席，在午饭的时候让被拘的二十六人同到花园内会议厅会餐。被拘的人消息隔断二十多天，这次得着团聚，互相说了很多话，很快乐的。”杨以德对周恩来说：“我向不报私仇的，诸位到这里来，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不但天津如此，全国都已这样了……现在事情快平静了，又赶着旧历年下，人人都得过年；诸位不能回家过，我让他们预备五桌席，请诸位在一块吃。我也同诸位谈谈，谁叫诸位犯着这个事呢？”会餐后，杨以德又发表了演说。



杨以德

北京学生声援天津同学 街头抗议集会遭镇压

二月四日，三千北京学生举行街头讲演集会，抗议天津当局为检查日货扣押学生以及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军警出动镇压声援天津的学生游行，伤十余人、捕一千六百余人，送往天安门拘禁至当天晚间方才予以释放；北京学生五日继续上街演讲，再次遭遇镇压。政府六日下令取缔学生反日运动，禁止学生干涉政治。全国学生联合会八日致电质问北京政府，上海各团体随即于次日举行爱国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月底，北京各界二十余团体召开国民大会，反对鲁案直接交涉及福州闽案问题，要求释放京津被捕学生，集会在军警干预下被迫解散。



北京民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反日游行

民國新聞

月刊

《改造》辟「社会主义研究」专栏，社会主义论战开始

重庆发生大火灾，五千余家被烧，死伤者达数百人

校长代表晤国务总理不欢而散 “安福系”主严处学潮日人幕后参与



吴炳湘

北京学潮爆发后，代理教育总长傅岳棻召集京城各大专院校校长会议，称已经接到段芝贵等军警首脑联名来函，质问“教育部有无制止学潮能力”，否则“将采取强硬措施”，傅岳棻要求校方约束学生行为，否则事态失控教育部也“无能为力”。国务总理靳云鹏曾秘密打过招呼，劝告学生“暂避风头”，天津被捕学生事宜“由国务院交涉”。二月三日，京城大专院校校长代表赴国务院会晤靳云鹏，但靳氏却表示山东交涉“木已成舟”，目前局面不宜释放被捕学生；校长代表则指责其身作为国务总理不应“任人摆布”，双方话不投机，口角一番

后不欢而散，学生闻讯决定继续抗议活动。是日晚间，北京军警主要负责人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和吴炳湘等在日本商人大仓位于北池子胡同的寓所集会，“安福系”阁员曾毓隽称外交次长陈篆在国务会议上已经通报日本公使提出外交抗议事宜，阁员主张“从严处置学潮”，会议延至深夜，决定采取直接行动取缔学生示威活动。出席者中还有公府日本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等日人。六日，北京政府在发布命令中称学生的抗议行为系“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若再有上街游行“轻者查明斥革，重者依法惩办”，学校当局“倘有徇私纵容，并予撤惩”。当日，北京各学校均有军警把守控制，禁止学生外出，电话线亦被割断，前往国务院交涉的校长代表也被阻止不得出行。十五日，北京学生联合会、教职员联合会被勒令查封并解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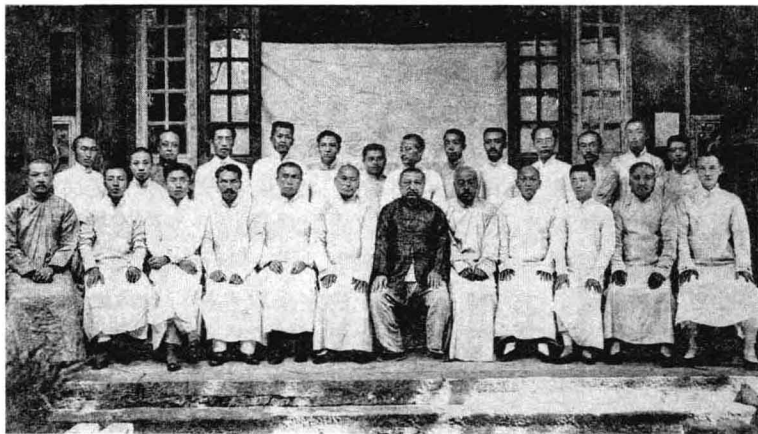
唐继尧与岑春煊“摊牌翻脸” 伍廷芳“携印出走” 粤政权破局

上海议和会议搁浅后，北洋派和军政府之间始终保持秘密接触。北方主和派江苏督军李纯在征得张作霖和曹錕的同意后，向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提出直接议和的五点主张，其中包括新旧国会同时停会以待北京政府召集联省会议修法、西南各省取消自主承认徐世昌的总统地位、中央成立弼政院以协调解决各方争议问题等条款。此时，滇、桂两系正因争夺驻粤滇军统率权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当岑春煊将李纯的条件拿到西南各省秘密传阅时，唐继尧便于三月二十四日将此事用明码电报给捅了出来，称此项办法“不符合护法宗旨”，不能接受，所有问题应“重开和会”而定。继唐继尧电报而来的，是国民党对岑春煊的指责，说其“既未获国会同意，又未提交政务会议讨论”，是一种“个人独裁和出卖上海和会”的不法行为。二十九日，国民党系的政务总裁伍廷芳宣布脱离军政府并出走香港。鉴于伍廷芳同时兼任军政府外交和财政部长，而出走时将



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中）早年即为清廷外交官，图为伍氏当年出访时的留影

这两个要害部门的大印随身携带，使岑春煊失去了门面上的支撑，更要命的是，根据一九一九年六月外交使团与北京政府达成的谅解，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可由军政府支配使用，但指定伍廷芳为领款人，所以伍廷芳“携印出走”这一招，实际是断了军政府的财源。岑春煊闻讯，急忙派人携亲笔信赴香港请伍廷芳回粤，但伍氏并不理会。



岑春煊和陆荣廷曾是一对“合作伙伴”。这是袁世凯时代刚刚结束的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桂系大佬陆荣廷（左六）和其属下在两广都司令部与岑春煊（左七）的合影

政府通令取缔集会游行 被捕学生移送法院 上海学联致电抗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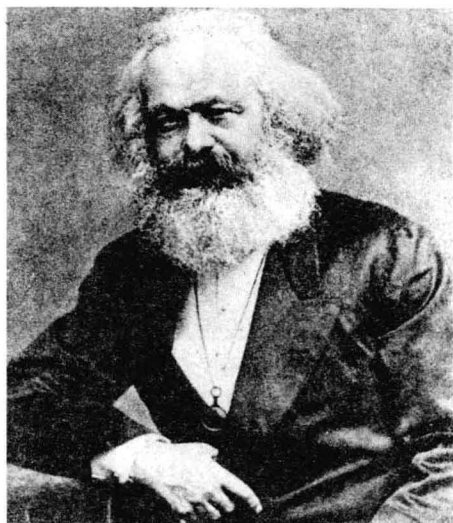
北京政府三月三日通令全国，要求严厉“取缔”学生、市民集会游行。二十三日，津京各校被拘留代表共四十三人被移送高审厅，上海学生联合会二十七日致电北京内阁，抗议将被捕学生移送法院之举。

维经斯基来华会晤李大钊陈独秀 北京大学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维经斯基生于一八九三年，俄国人，早年投身布尔什维克革命事业，奉共产国际委派到中国工作期间，使用中文名“吴廷康”

一九二〇年春，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先进者开始考虑筹组政党问题。三月，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遣全权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的发展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维经斯基的中文名是吴廷康，作为共产国际首位使者，其中国之行的主要任务是“联系”。维经斯基先到北京，会见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然后经李大钊介绍往上海会见陈独秀。逗留京沪期间，维经斯基向李大钊、陈独秀等讲述了俄国现状、介绍了苏俄对华政策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并重点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用李达的话说，经过与维经斯基的多次交谈，中国知识界先进者得出了“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所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被列入了日程”。三月三十一日，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北京大学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成员有高崇焕、邓中夏、罗章龙、王有德、何孟雄、刘仁静等，多是五四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研究会主要通过收集马克思主义书籍、举办座谈讨论、组织出版等工作，开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学习、研究和宣传活动，最终创造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条件。



北京大学红楼外景（左图）和卡尔·马克思像

民國新聞

月刊

长沙万余学生发表「驱张宣言」，
要求赶走湖南督军张敬尧
段祺瑞赴保定密会曹錕，望其出
面劝阻吴佩孚前线撤防

吴佩孚撤防动摇北京中枢 曹錕组“八省反皖联盟”南北夹击段祺瑞

一九二〇年四月，北洋军湖南前线大将吴佩孚一举一动，都足以使北京城内国家中枢操控者“血压升高手脚冰凉”，吴子玉擅自公开宣布撤防，让原本已风雨飘摇的北方政坛更趋摇摆不定。三月间，吴佩孚将数百直军家眷护送北归，并下令禁止官兵随意告假离岗，致电张敬尧请其接手直军防地，直隶总督曹錕也连发六电，要求准许吴佩孚回撤。北京政府答复曹錕“不同意吴佩孚部撤防”，陆军部直接电令吴佩孚，称“中央未有明令之前不得自由行动”。吴佩孚则回电说“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不理睬北京的警告。已经与徐树铮交恶的张作霖一改此前支持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的立场，假借祝寿名义在奉天召集地方实力派军事将领开会，商讨对付皖系的策略；四月八日，曹錕在保定举行隆重仪式悼念直军阵亡将士，其间秘密邀请河南、江苏、江西、湖北和东北三省督军代表外加吴佩孚开会，拟定联手对抗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措施。十一日出版的第《申报》披露了保定会议所通过三项条款，即“拥护靳云鹏内阁但不反段祺瑞；前线各省防军一律撤回但须保证南军不进攻；宣布安福系罪状并通电政府请求勒令解散”。保定会议实际形成了以曹錕和直系为首的“八省反皖联盟”。置身北京的段祺瑞闻讯大惊，意识到已经陷入奉系张作霖和直系曹錕北南夹击局面，一面试图以“副总统”为诱饵换取曹錕收回直军撤防的成命，一面大骂“马贼”出身的“北洋冒牌货”张作霖居然插手中央事务。曹錕不为所动，张作霖则指责徐树铮在关外图谋私利。看到直皖兵戎相见的危机迫在眉睫，段祺瑞只好向徐世昌表示退意，说“从此不管一切闲事，避居团河，闭门谢客”。



陈锦涛



伍廷芳

【“二唐”离职议长出走 广州军政府架构解体】广州国会两院四月六日召开联席会议，争吵激烈，军政府在八日举行的政务会议上决定解除伍廷芳兼任的外交、财政部长之职，由温宗尧、陈锦涛分别继任，但仍保留伍廷芳的政务总裁职务。军政府发表公报，谴责伍廷芳“弃职离省，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手续”，并带走剩余钱款近二百万元，致使军政府“国库空虚，军政开销无法应付”。同时电请北京政府转致外交使团，今后“关余直接交给军政府领收”，准备

请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廷芳十日在香港通电声明，不承认军政府决议，宣布继续履行外交和财政部长职务；二十五日，唐继尧、唐绍仪宣告脱离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分裂的同时，非常国会也发生集体出走事件。四月一日，广州国会众议院国民党系副议长诸辅成出走香港，临行前号召国民党议员一律集中港岛，而吴景濂、林森则指挥国会秘书厅将卷宗打包启运后也相继离粤赴沪。岑春煊派兵搜查两院，发现重要文件均不见踪影，遂气急败坏发出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诸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变志违法，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参谋总长李烈钧亦于几日后潜出羊城避往香港。四月上旬，已经有超过二百位国会议员抵达上海，此后留粤与抵沪议员展开隔空对骂，互相攻讦对方“通敌违法”。

“红年大热”引莫斯科关注 苏俄代表晤陈炯明许愿支持 北大学生刊物谓漳州“闽南俄罗斯”

四月二十九日，苏俄政府派遣的代表抵达漳州，与陈炯明举行会晤。莫斯科近来对陈炯明的关注越来越多，陈氏的诸多言行引起布尔什维克高层的注意，民国八年春天，陈炯明创办《闽星》，请陈秋霖为编辑，在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陈炯明表示“提倡社会主义，提倡新文化运动”；他对“十月革命”很是赞赏，不惜笔墨地大加颂扬，《闽星报》曾以“红年大热”为标题，专门论述布尔什维克革命问题。此次苏俄代表专程到福建与陈炯明联络，就是向他表示愿意资助完成“大事业”的态度，从此陈炯明和列宁之间也有了书信往来，而此时莫斯科还没有代表直接与孙中山联系。陈炯明的主张也受到北方学界的关注，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第十四号刊所载《游漳见闻录》一文中，作者盛赞陈炯明治下的漳州是“闽南的俄罗斯”，《闽星》的言论“很像是传播社会主义的”，认为“前广东督军陈竞存君是一个很热心革命的人”。



陈炯明

民國新聞

月
刊

上海学生罢课反日，淞沪护军使
卢永祥下戒严令

苏俄重申废止《中俄密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

谭人凤在沪逝世 黄兴生前称其“武昌首义功不可没”



谭人凤

华兴会主要发起人之一谭人凤于四

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逝世，终年六十岁。谭人凤字石屏，湖南新化人，一八六〇年出生。谭氏自义和团运动前后便与会党秘密联络，从事反清活动，一九〇三年参与发起华兴会，是广州黄花岗起义参加者；一九一一年夏季，谭人凤与宋教仁、陈其美创立同盟会中部总部，奔走往还长沙、武昌、九江，在长江流域起义准备过程中负责党务兼军事联络工作，是中部总部与黄兴的联络人，用黄兴的话说，谭氏乃“能争汉上为先着，此复神州第一功”。南京临时政府组成后，谭人凤反对南北议和、反对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并以“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名义驻节上海，间或通过发通电形式表达政治主张。北京民国政府成立后，谭人凤被任命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兼长江巡阅使，但并无作为。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案”爆发后，他坚

决主张联络各省“同兴问罪之师，以至仁伐至不仁”，后奉黄兴之命回湘策动谭延闿响应南京独立。“二次革命”失败，谭氏在北京政府陆军部的通缉名单上被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鉴于国内已无容身之地而亡命日本，改姓更名避居福冈县。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死后谭人凤回国，寄居上海。章太炎曾赞其“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吴佩孚朝发北撤兵过长沙而不入 赵恒惕夕起直追湖南战火再燃



赵恒惕

吴佩孚的直军第三师于五月二十五日开始从衡阳撤出，北军暂编第一师师长吴新田被张敬尧任命为“主持湖南防务司令官”，接管湖南前线。此前，吴佩孚与湘军代表签署条约，南北两军维持既有停战线，原停战协定继续有效。军队离开衡阳时，吴佩孚率师部居中“最后撤防，以防有变”。二十七

日，第三师由湘江顺流而下，军容整齐，势不可当，张敬尧虽然接到段祺瑞要其在长沙布设阻止直军继续北移第一道防线的命令，但他却并没有阻挡直军的勇气，只是下令在长沙周围区域宣布戒严，亲自坐镇指挥台监视直军行动：只要这位吴师长不进城夺他的督军大位，他也不会干预第三师的北撤。其实吴佩孚也无“战长沙”之意，二十八日令麾下各部以“环次队形”绕过长沙城直往汉口方向行进。直军北撤之际，也是湘军枕戈待命之时，西南方面称“大局转移，均此一举”，谭浩明、赵恒惕指挥所辖各部，拔营尾随吴佩孚部之后，与接防的张敬尧各部展开夺取城池的战斗。湖南战火于五月二十六日燃起，赵恒惕的湘军两日之间

连克祁阳、耒阳，二十九日再夺取了衡阳重镇，其间张敬尧属下各部均不战自退，与湘军展开“北向赛跑”。湖南枪声骤响，段祺瑞在第一时间便怒斥南方“背信弃义，破坏和平”，提议明令讨伐；徐世昌则不然，鉴于湖南人多年坚持驱张，谋求“湘事湘人自决”，认为这场战争是“对人不对事”，主要矛头是对准张敬尧的，所以湖南之变系“局部范畴的问题”，与南北总体大局并无关系，拒绝发布政府讨伐令。段祺瑞见徐世昌不肯合作，便暗中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和浙江五省督军，联名致电徐世昌，督促其明令讨伐湘军，并请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理由是“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

岑春煊补救军政府门面 旅沪议员谈话否认粤政权

国民党籍军政府要员纷纷离粤出走后，在广州的军政府只剩下岑春煊和林葆懌两位总裁，而且林葆懌也表示辞职之意，粤政权实际已濒临解体边缘。岑春煊急忙采取措施补救即将垮塌的“门面”，先“补选”广东督军莫荣新和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裁，但如此却给世人造成“军政府成清一色桂系天下”的印象，岑春煊等也觉不妥。五月四日，政学系召集留粤少数国会议员开会，再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和刘显世为总裁，以取代孙中山、唐绍仪和伍廷芳的空缺。熊克武和刘显

世分别属于四川和贵州系军阀，所以广州军政府的解体已是人皆认同的事实。伍廷芳、林森等抵达上海与孙中山会合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在上海召开国会，研究进一步剥夺广州军政府法律效力的问题。但是，鉴于伍廷芳已经被广州军政府提起诉讼，他汇到汇丰银行的款项被冻结，国民党在沪召开国会的计划受阻，于是，就在广州议员举行总裁补选的当日，云集上海的广东国会议员举行谈话会，决定将非常国会迁往云南，并发表宣言否认在粤军政府与国会。

外陷派系争斗内遭同僚质疑 靳云鹏这个总理不好当



靳云鹏



萨镇冰

鉴于外交问题无法解决、学潮危机难以平息、财政困局摆脱无望，更因为身陷派系争斗漩涡和直皖战争爆发在即，国务总理靳云鹏五月十四日提出辞职，并电请曹锟、张作霖“勿加挽留”。大总统徐世昌接受靳云鹏辞呈，任命海军总长萨镇冰暂时兼代理国务总理职。靳云鹏虽然是段祺瑞的人，但与段祺瑞的心腹、飞扬跋扈的徐树铮始终不和，在权力分配问题上更是剑拔弩张，以至于水火不能相容。当时大总统徐世昌任命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就是想以此抵消徐树铮的权势增长，这个谋略的始作俑者是直系的实际领袖曹锟和“关外王”张作霖。段祺瑞从来就没有将这位国务总理当回事儿，当吴佩孚在衡阳大闹撤防时，皖系为截断直军北归路线，决定以吴光新取代段祺瑞不大放心的赵倜出任河南督军，当国务会议的任命文件送到徐世昌处走盖印发表程序时，却被徐世昌以“决不允许因变更督军而致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为由给驳了回来。靳云鹏将实情向段祺瑞“禀报”，不料遭到段祺瑞的当面痛斥，说他是“没用的东西，如何配做总理？”靳云鹏忍受不了这种羞辱，曾想辞职。北京城的“安福系”政客也不把靳云鹏放在眼里，从二月间开始便连续发动倒阁行动，拆靳云鹏的台，骂他是签订中日共防协定的“卖国贼”，是背师忘义的“叛徒”。三月间，曹锟、张作霖等八省督军电请段祺瑞信任靳云鹏内阁，徐世昌也力挺靳云鹏，导致皖系的“安福政客”决心要将靳云鹏赶走。段祺瑞宁可让一个政敌主持国务院，也不能允许一个叛徒留在总理位子上。

外交部宣布，国际联盟行政院特别会议已经就中国加入国际联盟事宜达成一致，中华民国将从一九二〇年六月起正式成为国际联盟成员国。图为国联大会会场



民國新聞

月刊

- 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四团体六日被法租界巡捕封闭
- 外交部抗议日本中东铁路沿线增兵
- 国会审议通过中国对奥匈帝国和约